

#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基于 CNI 模型的研究\*

过琳<sup>1</sup>, 云祥<sup>2</sup>

(1.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 南京 211200; 2. 南京警察学院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 CNI (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 模型, 通过两个研究考察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困境判断影响。研究 1 考察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结果显示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表现出更强的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总体的不行动偏好, 因而作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研究 2 探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启动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与启动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个体相比, 启动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的个体对道德规范更敏感, 因而作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整个研究表明,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主要通过影响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自身的行动偏好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 但在对自身行动偏好的影响上,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与启动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存在差异。

**关键词:**CNI 模型; 道德困境判断;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4)02-0150-08

## 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某城市, 是否应该采取封城措施, 以阻止其广泛传播呢? 如果采取封城措施, 可以有效延缓疫情的全国蔓延, 但城内居民将很可能因更严重的疫情感染、医疗资源挤兑和生活资料匮乏而导致死亡率上升; 而如果不封城, 很可能导致疫情全国蔓延, 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封城与否的决策困境, 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上的考量: 牺牲某一城市的福祉来保障国家整体的利益, 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吗? 面对这样的道德困境, 东西方社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倾向, 相比于西欧、北美等西方社会, 东方社会更容易做出封城的防疫措施 (Jamison & Wu, 2021; 黄丽芹等, 2022)。而从道德判断的功利主义原则来看, 作出封城决策, 显然符合道德的功利主义选择, 那这是否意味着东方社会相比于西方社会更偏好功利主义道德呢? 由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区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核心维度 (Oyserman, 2011; Triandis, 1996), 因此, 该研究旨在探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 并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 CNI 模型深入分析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如何通过影响人们 (1) 对后果的敏感性, (2) 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 以及 (3) 一般行动倾向 (或三者的某种

组合) 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

### 1.1 道德困境判断与 CNI 模型

人们在作出道德决策或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 常常依据两种标准: 功利主义和义务论 (Cushman et al., 2010)。功利主义基于行为的后果作出道德判断, 如果某个伤害行为能够带来更大的福祉, 其在道德上就是可接受的; 义务论则强调道德规范本身, 如果行为本身违背道德规范, 那么即便该行为能够最大化收益, 在道德上也不可接受。为探讨导致人们作出功利主义或义务论判断的决定因素, 研究者通常采用道德困境判断范式进行研究。该范式认为可以通过设置同时包含功利主义原则和义务论原则, 但只能选择其一的道德两难情境来测量个体的道德判断取向。其中“电车困境” (Trolley Problem) 及其变式应用最为广泛。在经典电车困境中, 选择扳动扳手, 杀死 1 人救 5 人, 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 而选择不扳扳手, 让电车按原轨道行驶下去撞死 5 人, 则被认为是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尽管“电车困境”及其变式被广泛运用于道德判断研究, 但其在方法论上却受到一些批评。其中一个重要批评是该方法将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视为对立的两极, 接受或拒绝某种选择, 被视为支持义务论 (功利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2020SJB0213)。

通信作者: 云祥, E-mail: Yunx@nipc.edu.cn。

主义)或功利主义(义务论),而这与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Amit & Greene, 2012)相违背(Gawronski et al., 2017)。此外,该方法在结果解释上混淆了其他的变量(Gawronski et al., 2017),例如判断为功利主义的结果中混淆了个体的一般行动倾向(general preference for action),而判断为义务论的结果中混淆了个体的一般不行动倾向(general preference for inaction)。这些混淆使得研究者难以分清结果、规范和一般反应倾向在驱动道德判断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特定因素通过影响哪些方面来塑造个体的道德判断。

为解决上述问题,Gawronski 等人(2017)提出了包含结果、规范和一般反应倾向的道德判断 CNI 模型。在 CNI 模型中,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由三个潜在的心理过程共同驱动:结果敏感性(sensitivity to consequence)、道德规范敏感性(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和个体的自身的反应倾向(general inaction/action tendency),并分别用结果驱动的反应(C 参数)、道德规则驱动的反应(N 参数)和个体自身的反应倾向(I 参数)来表征。为了验证 CNI 模型是否能够有效分离道德困境判断中潜在的心理过程,研究者设计了 6 种基本的道德两难情境,每种道德两难情境包括行为结果(收益大于成本 vs. 收益小于成本)×道德规则(禁止行动 vs. 倡导行动)4 个版本。根据被试对 24 个道德两难情境的反应,研究者利用多项式建模的方法(Hütter & Klauer, 2016)估计出反映被试道德判断潜在心理过程的 C 参数、N 参数和 I 参数。研究表明,CNI 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被试判断时的心理过程,已被应用于探索性别、情绪、语言、意识形态和精神病态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中,为进一步分析道德判断的潜在心理过程提供了良好的模型框架(Gawronski et al., 2017; Gawronski et al., 2018; Luke & Gawronski, 2021; Gawronski, 2022)。

## 1.2 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与道德困境判断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的概念(Oyserman, 2011)。集体主义文化关注群体或社会水平,重视忠诚、义务、角色和职责,强调凝聚力、情绪控制、和谐的关系、人际之间的相互依赖等;而个体主义文化则强调个体与他人和群体的差异,关注个体自由、个人成就、自主性、独立性和独特性,倾向情感的公开表达和可选的人际关系(Oyserman et al., 2009)。通过社会习俗、行为规范

和育儿实践等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不同文化模式必然对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文化模式对道德心理的影响近来开始受到研究者关注(胡晓檬等, 2018; Awad et al., 2020; Graham et al., 2016; Sorokowski et al., 2020)。道德困境判断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不同文化模式下,人们的道德判断倾向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个体(西欧和北美),东方文化背景的个体(东亚)在电车困境及其变式中的更少做出功利主义倾向的选择(Awad et al., 2020; Gold et al., 2014; Moore et al., 2011; Sorokowski et al., 2020)。由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东方文化偏向集体主义,上述的结果似乎意味着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少导致个体做出功利主义判断。但是由于已有的跨文化研究并未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作为可操控的变量,因此观察到的跨文化的道德判断差异不足以证明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差异造成,其他的跨文化差异,也可能是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例如,Gold 等(2014)认为中国人在道德困境判断中更少的功利主义偏好可能是因为道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命运、道法自然等思想仍然在中国人中流行,这些思想暗示着人们要尊重事物本身的发展趋势,不要人为的干涉,这可能影响中国被试在电车困境中做出不扳动扳手的选择;Awad 等(2020)强调东亚社会的低关系流动性(relation mobility)特征是其做出较少功利主义选择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核心维度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否影响了东西方被试的道德困境判断的差异呢?已有的跨文化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有以国内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与具有明显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相比,明显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在道德两难困境中更少作出功利主义判断(肖丽辉, 2017)。然而上述多采用道德困境的传统范式,如前所述,传统范式对结果的解释存在缺陷,且难以探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判断潜在心理过程的影响上存在的差异。而如果基于 CNI 模型,上述研究显示的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比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在两难困境中更少功利主义的结果可能是源于以下三个原因或三个原因的某种组合:(1)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对结果更敏感,(2)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对道德规范更敏感,(3)集体主义倾向被试有更强的不行动偏好。那么到底是哪种原因导致这一结果呢?根据已有的关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影响的研究来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

对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的结果敏感性 C 参数、道德规范敏感性 N 参数和自身行动偏好 I 参数会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具体阐述如下:

C 参数表征的是对结果的敏感。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在对 C 参数的影响上可能较为复杂。一方面,根据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对结果的敏感源于个体对行动成本和收益进行平衡的审慎认知的结果。而 Oyserman 在总结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知模式的差异时提出,集体主义下个体的认知模式有审慎和深思熟虑的特征 (Oyserman, 2011),由此可见集体主义应该比个人主义对结果更敏感。但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还显示集体主义者对情境变化很敏感,关注细节,背景和元素,倾向用较低的解释水平来处理信息 (Oyserman & Lee, 2008),个人主义者则更偏好采取去情境化的思维方式,对抽象信息和核心信息回忆更快、更准确,倾向用较高的解释水平来处理信息 (Oyserman & Lee, 2008),而对情境的高水平解释则会导致个体倾向关注结果的功利主义 (Aguilar et al., 2013; Amit & Greene, 2012),从这个角度看,集体主义则应该比个人主义对结果更不敏感。基于上述的分析,认为在道德困境判断中,上述两个方向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导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 C 参数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N 参数反映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在对集体主义的特征进行描述时,强调社会规范作为集体主义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的重要性,集体主义提倡个体履行自己社会角色的责任和义务,以维护群体和谐 (Triandis, 1996),对违反规范的容忍度较低 (Mu et al., 2015),因此,相比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可能导致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对道德规范更敏感,即增加 CNI 模型中的 N 参数。

I 参数表征的是在对道德困境做出选择时,既不依赖后果,也不依赖规则,而是基于个体自身一般反应倾向。如果个体倾向于不行动,则无论规则和结果如何,都不行动。而如果个体倾向于行动,则无论规则和结果如何都倾向行动。研究发现,相对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行动 (Oyserman, 2011),更冲动 (Takahashi et al., 2009),更多冒险行为 (An et al., 2020; Pokhrel et al., 2018),以及较低的自控 (Li et al., 2018)。因此,在道德困境判断中,集体主义相对个人主义,可能更偏好不行动。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 CNI 模型,通过两个研究

来考察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具体来说,研究 1 通过问卷测量被试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然后考察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与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在道德困境判断中 C 参数、N 参数和 I 参数上的差异;研究 2 通过文化启动的方法启动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然后探讨不同文化自我构念对在 C 参数、N 参数和 I 参数的影响。

## 2 研究 1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与道德困境判断

研究 1 探讨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首先使用问卷测量被试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然后让被试完成用于 CNI 模型分析的 24 题道德困境判断材料。

### 2.1 方法

#### 2.1.1 被试

通过方便取样,共招募 403 名在校本科生,所有被试在此之前未参加过类似研究。由于道德困境判断材料阅读量较大,为保障数据质量,在该材料最后设置一个注意检查项目,以确认被试是否认真阅读材料。删除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和未完成全部问卷的被试 59 人,导致最终被试人数为 344 人 (女生 90 人),年龄范围在 17 ~ 22 岁之间,平均年龄 18.7 岁 ( $SD = 0.98$ )。

#### 2.1.2 研究工具

##### (1)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问卷

采用王永丽等人 (2003) 修订的 Singelis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问卷中文版。问卷包含垂直个人主义、水平个人主义、垂直集体主义、水平集体主义 4 个维度,共 15 道题,采用 5 点计分。在研究中只考虑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大维度,其信度系数分别为 0.79, 0.74。

##### (2) 道德困境判断材料

道德两难情境材料以 Gawronski 等人 (2017) 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为基础做出适当修改,每种困境包括 4 个平行版本 (禁止型/倡导型道德规范  $\times$  行动收益大于/小于成本),共 24 个道德两难情境。每个道德困境都要求被试判断困境中的道德主体的行为是否可以接受 (不可接受 vs. 可以接受)。材料最后设置一项注意检查任务,要求被试在三个选项中选择指定的选项,如被试未按照要求作出选择,则表示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

#### 2.1.3 数据处理

##### (1) 计算被试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

首先分别计算被试在集体主义维度和个人主义维度上的平均分,然后用集体主义得分减去个人主义得分。如果得分大于0,表示该被试相对偏好集体主义,将其归入集体主义倾向;如果得分小于0,则表示该被试相对偏好个人主义,将其归入个人主义;如果得分为0,认为其倾向不明,不纳入后续分析。经整理得到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114人,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221人。

(2)道德困境判断材料的数据处理

将收集的数据录入SPSS之后,首先使用Gawronski等人(2017)提供的SPSS脚本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然后使用multiTree软件(Moshagen, 2010)进行CNI模型分析,multiTree的CNI模板文件由Gawronski等人(2017)在文章的补充材料中提供。

2.2 结果与分析

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困境分析方法分析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异,然后使用CNI模型进一步分析不同文化倾向的被试在道德困境判断C参数、N参数和I参数上的差异。

传统道德困境分析方法仅关注禁止性道德规范下行为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倾向

于接受行动被认为是功利主义倾向,而倾向不接受行动,则被认为是义务论倾向。在该研究提供的道德两难材料中,共有6个上述情境,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在6个情境中选择行动是“可以接受”的平均次数为2.54( $SD = 1.43$ ),个人主义的被试为2.89( $SD = 1.52$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两组间差异显著, $t(333) = 2.12, p < 0.05, d = 0.25$ 。即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比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更偏好功利主义判断。

CNI模型分析显示收集的数据和CNI模型的拟合良好, $G^2(2) = 0.76, p = 0.68$ 。不同文化倾向被试的CNI参数估计值见表1和图1。两组被试在C参数上差异不显著, $\Delta G^2(1) = 0.05, p = 0.82$ ;在N参数上差异显著, $\Delta G^2(1) = 14.20, p < 0.001, d = 5.84$ ,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显著大于个体主义倾向的被试;在I参数上差异显著, $\Delta G^2(1) = 5.11, p < 0.02, d = 3.33$ ,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显著大于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这些结果表明在道德困境判断中,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相对于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对道德规范更敏感,在不考虑结果和规范影响时更不偏好行动。

表1 不同文化倾向被试的CNI参数和置信区间

组别	C 参数		N 参数		I 参数	
	M	95% CI	M	95% CI	M	95% CI
集体主义 ( $n = 221$ )	0.14	[0.11, 0.16]	0.31	[0.27, 0.34]	0.53	[0.51, 0.55]
个人主义 ( $n = 114$ )	0.13	[0.09, 0.17]	0.20	[0.16, 0.25]	0.49	[0.47, 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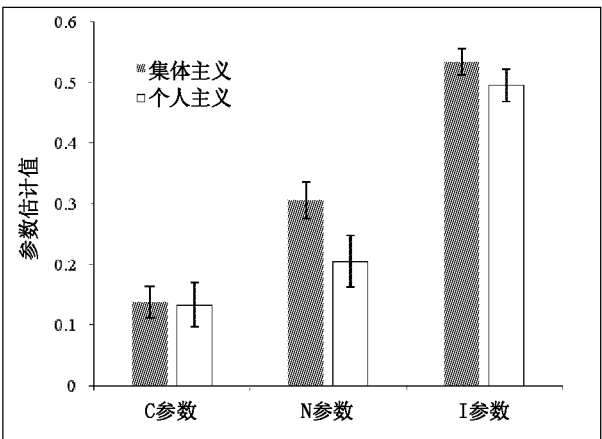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文化倾向被试的CNI参数差异

研究1通过问卷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比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更少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进一步使用CNI模型分析发现这种偏好与集体

主义倾向的个体在面对道德困境时,更关注道德规范、更不倾向于行动有关。由于研究1的问卷研究并不能对文化倾向变量进行严格操控,其结果实质上仅能反映文化倾向与道德困境判断的相关关系,不能做出因果关系的推论。因此,研究2将采用实验的方式,通过激活被试的不同文化构念,考察其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

3 研究2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启动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

研究2采用文化启动的方法操控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然后使用CNI模型分析不同文化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在系列道德困境中反应模式。具体来说,通过启动不同文化模式,考察个体在对结果敏感性(C参数)、道德规范敏感性(N参数)以及个体自身不行动/行动倾向(I参数)上的差异。

### 3.1 预实验

正式实验之前,首先对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启动方式进行前测。前测采用圈写代词方法。首先让被试阅读一段材料,然后让被试圈出材料中的“我”、“我的”(“我们”、“我们的”),最后使用王永丽等人(2003)修订的 Singelis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问卷中文版验证启动效果。阅读的材料使用 Oyserman 等人(2009)所提供的中文启动材料并做适当修改。40 名大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在阅读完启动材料后,完成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测量。

结果显示,对于启动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的被试,在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在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维度的得分( $M_{\text{集体}} = 3.79 > M_{\text{个人}} = 3.17, t = 4.02, p < 0.01, d = 1.59$ )。而对于启动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被试,在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在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维度的得分( $M_{\text{个人}} = 3.75 > M_{\text{集体}} = 3.23, t = 5.01, p < 0.01, d = 1.26$ )。因此,可以认为文化自我构念的启动方式是有效的。

### 3.2 被试与设计

研究共招募 97 名在校本科生,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被试随机分配到启动集体主义组和启动个人主义组。由于 1 名被试未按要求完成文化启动任务,7 名被试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导致最终样本为 89 名(女生 19 人),平均年龄 20.2 岁( $SD = 1.25$ )。其中启动集体主义组 43 人(女生 9 人),启动个人主义思维模式组 46 人(女生 10 人)。

### 3.3 研究工具

#### 3.3.1 文化启动

采用圈代词任务的方法进行文化启动。启动材料同预实验。该方法要求两组被试都阅读一段描述外出吃饭的文字(约 250 字),并将其中的人称代词圈出。启动集体主义的被试阅读的文字中的人称代词只含有“我们”,而启动个人主义的被试阅读的文字中“我们”全都替换成了“我”。

#### 3.3.2 道德困境材料

同研究 1

#### 3.4 数据处理

CNI 模型的数据处理同研究 1。

#### 3.5 结果与分析

传统道德困境分析显示启动集体主义的被试在 6 个情境中选择行动是“可以接受”的平均次数为 2.73( $SD = 1.26$ ),启动个人主义的被试为 3.30( $SD = 1.36$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两组间差异显著, $t(87) = 2.01, p < 0.05, d = 0.43$ ,启动集体主义的被试显著小于启动个人主义的被试,这表明传统分析框架下,启动个人主义的被试比启动集体主义的被试更偏好功利主义判断。

CNI 模型分析显示收集的数据和 CNI 模型的拟合良好, $G^2(2) = 1.49, p = 0.47$ 。不同文化启动组被试的 CNI 参数估计值见表 2 和图 2。两组被试在 C 参数上差异不显著, $\Delta G^2(1) = 1.93, p = 0.16$ ;在 N 参数上差异显著, $\Delta G^2(1) = 17.96, p < 0.001, d = 5.68$ ,集体主义启动的被试显著大于个体主义倾向的被试;在 I 参数上差异不显著, $\Delta G^2(1) = 0.28, p = 0.59$ 。以上结果表明,集体主义启动的被试在道德困境判断中对道德规范更敏感,但在对结果的敏感和自身的行动倾向方面与启动个人主义的被试无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启动组被试的 CNI 参数和置信区间

组别	C 参数		N 参数		I 参数	
	<i>M</i>	95% CI	<i>M</i>	95% CI	<i>M</i>	95% CI
集体主义启动 ( <i>n</i> = 43)	0.26	[0.21, 0.31]	0.50	[0.43, 0.58]	0.44	[0.37, 0.52]
个人主义启动 ( <i>n</i> = 46)	0.21	[0.15, 0.26]	0.29	[0.22, 0.36]	0.41	[0.37, 0.47]

## 4 讨论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道德困境判断的传统分析方法和 CNI 模型法,研究特别关注个体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上的差异是否造成道德困境判断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是否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对驱动道德困境判断形成的三个潜在心理过

程(对结果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以及对行动的一般偏好)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导致。

传统分析显示,无论是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的差异,还是激活的不同文化自我构念,都能够影响个体的道德困境判断。具体来说,有相对较强集体主义倾向或激活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的被试在道德困境判断中更少作出功利主义道德判断。这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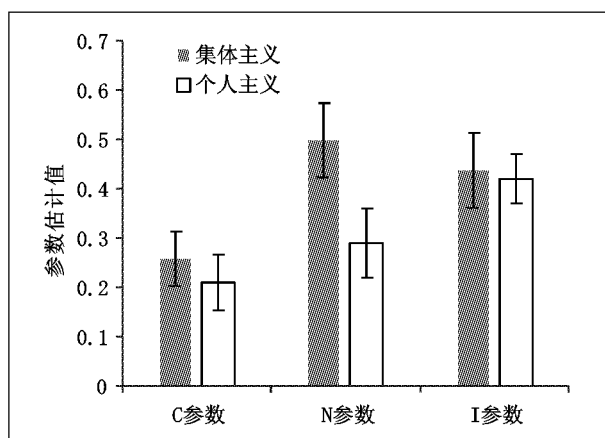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启动组在CNI模型参数上的差异

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肖丽辉,2017)。这一结果也说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差异可以解释跨文化研究发现的东方被试比西方被试在道德困境判断上更少做出功利主义选择的结果。

采用CNI模型分析,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如何通过影响道德困境判断的C参数、N参数和I参数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的结果。研究显示,对C参数的影响上,无论是个体的文化倾向,还是激活的文化自我构念,都未显示出显著差异,即对结果敏感性的影响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无显著差异,这与假设一致。如前文所述,具有审慎认知特征的集体主义会促进对行动结果的敏感性,而对信息倾向高水平解释的个人主义同样也会提高对行动结果的敏感性,因此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能够提高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的C参数,导致在C参数上未显示出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说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少作出功利主义选择并非源于集体主义文化降低了个体对结果的敏感性。

在对N参数的影响上,研究显示相对偏好集体主义和启动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的被试在CNI模型中的N参数值更高,说明集体主义导致个体对道德规范更敏感,减少个体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该结果验证了假设,并在一定程度可以用来解释众多研究显示的东方文化背景的被试在道德困境判断中相对更少偏好功利主义的结果(Awad et al., 2020; Gold et al., 2014; Sorokowski et al., 2020)。

在对I参数的影响上,研究1显示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的I参数显著高于个人主义倾向的被试,说明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在面对道德困境时,无论结果和规范如何,都不倾向于行动,该结果与假设一致。但研究2却显示激活不同文化自我构念的被试

在I参数上差异不显著。这说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与激活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在对I参数的影响上存在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研究发现,基于CNI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很好地解释传统分析得到的集体主义可以减少功利主义道德选择的结论。因为无论是研究1显示的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表现出更高的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更强的不行动偏好,还是研究2得到的集体主义自我构念导致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的提高,都会促进个体做出义务论的道德判断,而在传统分析框架下,义务论的增加则意味着功利主义的减少。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使用CNI模型更清晰地展现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一文化差异维度对道德困境判断背后心理过程(基于结果、基于规则和个体自身的反应倾向)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道德困境判断的跨文化差异,并为其潜在的机制提供新的见解,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

另外,该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的结论是基于中国的大学生样本,虽然对相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差异研究可以更好地控制与文化背景相关的其他变量的影响,但是相同文化背景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差异或激活的相同文化背景个体的不同文化自我构念,不会等价于跨文化样本之间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差异,因此将该结论用于跨文化差异的解释时,不可避免地会降低解释的生态效度;其次,该研究所使用的道德困境材料虽然是基于“真实世界”改编(Gawronski et al., 2017),但仍然多是涉及生死攸关的极端和不寻常的主题,并不代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道德挑战。而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涉及个人利益和他人福祉之间的艰难选择或者对他人道德义务的履行等的道德问题恰恰更可能体现不同文化倾向个体的选择差异,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日常道德困境材料来研究不同文化倾向个体的道德选择。三是该研究未能合理解释文化倾向与启动的文化自我构念对道德困境判断I参数影响存在的差异,这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 5 结论

该研究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模型来考察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1)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对道德规范更敏感,更

少的行动偏好,更少作出功利主义道德判断;(2)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的启动导致个体对道德规范更敏感,减少个体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

### 参考文献

- 胡晓檬,喻丰,彭凯平.(2018).文化如何影响道德?文化间变异、文化内变异与多元文化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6(11),2081-2090.
- 黄丽芹,孙寅,罗思阳.(2022).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对疫情控制效果的影响及其计算心理机制.心理学报,54(5),497-533.
- 王永丽,时勘,黄旭.(200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结构的验证性研究.心理科学,26(6),996-999.
- 肖丽辉.(2017).高冲突道德两难情境中的道德判断:双过程与自我因素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 Aguilar, P., Brissino, S., & Fernández - Dols, J. - M. (2013).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creases uncompromising consequenti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3), 449-452.
- Amit, E., & Greene, J. D. (2012). You see, the ends don't justify the means: Visual imagery and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8), 861-868.
- An, Z., Cao, Z., Chen, Z., & Li, D. (2020). Does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impact operational risk?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6(3), 808-838.
- Awad, E., Dsouza, S., Shariff, A., Rahwan, I., & Bonnefon, J. - F. (2020). Universals and variations in moral decisions made in 42 countries by 70,000 participa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5), 2332-2337.
- Cushman, F., Young, L., & Greene, J. D. (2010). Our multi-system moral psychology: Towards a consensus view. In J. M. Doris (Ed.), *Oxford handbook of moral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wronski, B., Armstrong, J., Conway, P., Friesdorf, R., & Hütter, M. (2017). Consequences, norms, and generalized inaction in moral dilemmas: The CNI model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3), 343-376.
- Gawronski, B., Conway, P., Armstrong, J., Friesdorf, R., & Hütter, M. (2018). Effects of incidental emotions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An analysis using the CNI model. *Emotion*, 18(7), 989-1008.
- Gawronski, B. (2022). Moral impressions and presumed moral choices: Perceptions of how moral exemplars resolve moral dilemma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9, 104265.
- Gold, N., Colman, A. M., & Pulford, B. D. (2014).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s to real-life and hypothetical trolley problem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9(1), 65-76.
- Graham, J., Meindl, P., Beall, E., Johnson, K. M., & Zhang, L. (2016).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oral judgment and behavior, across and within societie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125-130.
- Hütter, M., & Klauer, K. C. (2016). Applying processing trees in social psych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7(1), 116-159.
- Jamison, D. T., & Wu, K. B. (2021). The East-West divide in response to COVID-19. *Engineering (Beijing, China)*, 7(7), 936-947.
- Li, J. B. T., Vazsonyi, A., & Dou, K. (2018). Is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ssociated with self-control? Evidence from Chinese and U. S. samples. *PLoS ONE*, 13(12), e0208541.
- Luke, D. M., & Gawronski, B. (2021). Political ideology and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An analysis using the CNI mod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7(10), 1520-1531.
- Moore, A. B., Lee, N. L., Clark, B. A., & Conway, A. R. (2011). In defense of the personal/impersonal distinction in moral psychology research: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 of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moral judgment.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6(3), 186-195.
- Moshagen, M. (2010). multiTree: 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analysis of 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2(1), 42-54.
- Mu, Y., Kitayama, S., Han, S., & Gelfand, M. J. (2015). How culture gets emplace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of social norm vio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50), 15348-15353.
- Oyserman, D. (2011). 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 Cultural mindsets, cultural fluency, and meaning making.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2(1), 164-214.
- Oyserman, D., & Lee, S. W. S. (2008). Does culture influence what and how we think? Effects of prim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2), 311-342.
- Oyserman, D., Sorensen, N., Reber, R., & Chen, S. X. (2009). Connecting and separating mind-sets: 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2), 217-235.
- Pokhrel, P., Bennett, B. L., Regmi, S., Idrisov, B., Galimov, A., Akhmadeeva, L., & Sussman, S. (2018).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ocial self-control and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Substance Use & Misuse*, 53(7), 1057-1067.
- Sorokowski, P., Marczak, M., Misiak, M., & Bialek, M.

- (2020). Trolley dilemma in Papua. Yali horticulturalists refuse to pull the lever.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7, 398 – 403.
- Takahashi, T., Hadzibeganovic, T., Cannas, S. A., Makino, T., Fukui, H., & Kitayama, S. (2009). Cultural neuroeconomics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Neuro Endocrinology Letters*, 32(2), 185 – 191.
- Triandis, H. C. (1996). The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syndro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4), 407 – 415.

##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on Moral Judgments: An Analysis Using the CNI Model

Guo Lin<sup>1</sup>, Yun Xiang<sup>2</sup>

(1. Office of Academic Discipline Development,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200;

2.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Nanjing Polic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by using the CNI model. Study 1 explored the impact of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tendency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and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collectivism tendency showed more 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and stronger general inaction preference i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and thus exhibited les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Study 2 examined the effect of the priming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self – construct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It wa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with individualism self – construct priming, those with collectivism self – construct priming displayed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This suggested that collectivism self – construct priming decrease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culture mainly affected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by influencing 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and general action tendency, but in terms of influence on general action tendency,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tendencies and the primed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self – construct.

**Key words:** CNI model; moral dilemma judgement;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